

抬周恩来过草地

龚孝鹏

1935年长征途中，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，8月21日，红军右路军开始过草地。正在病中的周恩来随彭德怀率领的第三军(原红三军团)殿后。中央军委兵站运输部部长杨立三(湖南长沙人，后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)也在这支队伍中。

所谓草地，就是川西北地区的松潘草原，面积15200多平方公里，海拔在3500—4000米左右，白河、黑河由南而北纵贯其间。由于排水不畅，积水而成的湖泊星罗棋布，形成大片大片的沼泽。沼泽内污水横流，气味难闻。经年的水草盘根错节，形成一块块的草甸覆盖在沼泽上面。水草枯了生，生了枯，不断腐烂，形成一块块厚厚的橡皮泥，人踩在上面软乎乎，稀松松，一不小心便会陷进去。

这样的道路状况，即使年轻体壮的人要通过也是极不容易的，更何况体弱多病的周恩来呢！

是的，此时的周恩来身体极为虚弱，从十多天前就经常昏迷，由于连续发高烧，已有五六天没吃什么东西了，根本起不了床。

看着周恩来这个样子，杨立三心里非常难过。他亲眼看到，长征以来周副主席一直处于超负荷的运转之中，每到一地他随便找个地方，就坐下来处理各军团发来的电报，然后就研究敌情，寻求方案，起草命令，往往忙完后天就快亮了。他随便躺一下，又起来和部队一起行军。由于睡眠不足，有时走着走着就昏睡摔倒了。有几次，杨立三便是把他扶上担架，让他利用行军时间休息一会。但他稍躺一会儿，又下来步行。

这次周恩来的病势异常凶猛。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最常见的疟疾来治，但几天后仍高烧不退，而且肝部肿大，皮肤黄染，最后医生确诊为肝炎，且已发展成阿米巴肝脓肿。为了降体温，医生让通信员去60里以外的高山上取来冰块，敷在他的肝部，但仍不能解决多大问题。

部队行动在即，怎么办？

彭德怀十分焦急，他思索一阵后，毅

然决定：“抬！”

彭德怀找来三军团参谋长的萧劲光，嘱咐他：“恩来同志生病，不能行动，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一个担架队来抬。我们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，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草地！”

萧劲光接受任务后，就抽人组成了担架队，。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（湖南湘乡人，1955年授大将军衔）听说后，找到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，要求当担架队队长。杨立三更不甘落后。此时他身体虽然有病，但坚决要求参加抬周恩来的担架队。陈赓劝他：

“杨部长，你的身体也有病，就不用参加了吧。只要你自个儿能安全过草地，我将来请你喝酒。”

杨立三知道陈赓爱开玩笑，就说：“你的酒我喝定了。我不但自个儿要过得去，而且要抬着周副主席一起过去。”

杨立三与担架队的同志，一起抬着周恩来进入了草地。

这真是一次艰难的行程啊！脚底下要时时注意一个个的泥潭，稍不小心一脚踩进去就很难拔出来；鼻子闻到的是污水和腐草发出的呛人的气味。从休养连赶来照看周恩来的邓颖超，在行进中一不小心陷进了泥潭，污泥浊水一下漫上身体，她本来正患肺结核，现在只感到头昏眼花，憋得喘不上气来。她又不敢乱用劲，因为越用劲就会陷得越深。此时，多亏后面赶来的一个同志把她拉出了泥潭。当邓颖超赶到周恩来身旁时，杨立三看着浑身透湿、步履蹒跚的她，几乎认不出来了。

草地上的天气真像孙猴子的脸，说变就变，时而漫天飞雪，时而冰雹骤降；不一会又狂风四起，大雨倾盆。每当此时，杨立三和陈赓就慌不迭地拿出油布和斗笠，盖住周恩来的头部和上身，而自己被浇淋得像落汤鸡也不在乎。

杨立三以自己的有病之躯抬着周恩来过草地，两天下来，肩膀磨破了，脚部及小腿也被扎出了一道道血口子，经雨水和泥水一浸，疼得钻心；继而变得红肿，溃

烂。但他一声不吭，咬牙坚持着，可还是被大伙发现了，战士们劝他不要抬了，在旁边护着就行，但他根本不听，照样轮班抬担架。周恩来不忍心让杨立三和战士们这样为他吃苦，一次次要从担架上爬下来，但每次都被杨立三和大伙劝住了。杨立三望着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，脑海里浮现出和这位伟人一次次的交往来……

1927年夏，杨立三从湖南老家跑到武汉，第一次见到党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。是周恩来介绍他去叶挺部工作，从此，他走进了人民军队的行列。

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时，周恩来已从上海来到了瑞金。他在繁忙的政治、军事斗争中，亲自抓红军的后勤工作，杨立三多次得到他的指示和教诲，胜利地完成了反“围剿”的兵站后勤保障任务。

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时，王明的“左”倾机会主义发展到极点，在革命队伍中大抓“AB团”。“AB”是英文“反布尔什维克”的简写，扩大化的打“AB团”错杀了许多革命同志。当时有人怀疑杨立三与“AB团”有染，保卫局也找上了门。是周恩来让刘伯承出面调查，弄清了事情真相，使他免受了一场不白之冤……

正是周恩来的人品、人格力量，给了杨立三无穷的精神力量，他不光以兵站运输部部长的身份，更是以一名普通红军战士的身份，抬着敬爱的军委副主席过草地的。

草地的夜晚，格外寒冷和潮湿。担架队在一个小土丘旁停下露营，大家煮些青稞面糊糊掺野菜充饥。杨立三躲在一旁，悄悄脱下衣服察看被担架压烂的肩膀，他使劲一扯，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原来衣服与压烂的肩膀粘在一起，这一扯，刚凝成的痂又流血了。不光肩膀疼，杨立三感到脖子直挺挺的也不能动了，稍一歪就一阵疼痛。

“这才是第四天啊，我一定要坚持抬着周副主席走完最后几天，到达胜利的彼岸！”他暗暗下定这样的决心，又悄悄穿上了衣服。



淮安古代名胜樱桃园

徐爱明 徐 晓

淮安区的关天培路和永怀东路之间，有条东西向的路叫樱桃园路，它沟通了淮安区的经八路、梁红玉路、铁云路、237省道，是淮安区新城区建设中的一条重要干道。可是很多本地人经过此道时总会犯嘀咕：这条路的名称怎么这么奇怪，淮安区哪来的樱桃园？殊不知，樱桃园在古代淮安的历史上是很有名的。

现存淮安最早的府志万历《淮安府志》中写道：“樱桃园，在观风门外。”其后的正德《淮安府志》卷之十四“古迹”也记载着：“樱桃园，在观风门外。”天启《淮安府志》卷之二十三从纪志“古迹”中同样记载着：“樱桃园，在观风门外。”《观风门就是淮安三城中旧城（老城）的东门，由此可知，樱桃园当在淮安东门之外。所以后来的光绪《淮安府志》卷三十七“古迹”中就记着“樱桃园，在东门外”。樱桃园究竟位于何处？明代的三部府志中都没有明确记载。而到了清朝，乾隆《淮安府志》卷二十八“古迹”中记载道：“樱桃园在观风门外，去城十里，刘伶台之西。”至此，我们已经知道，樱桃园原来就在现在的淮安区域东乡刘伶村的刘伶台（现已不存）附近。

毫无疑问，樱桃园因盛产樱桃而得名，也因樱桃风景而出名。乾隆中，淮安岁贡生杨其禄《号绿园》《访樱桃园故址》诗中描写了樱桃园美丽的风景。诗云：“郁郁城东门，灵源通海峤。土风既雄杰，山水亦清妙。一径入幽闲，樱桃园窈窕。三春乍气蒸，花发红如烧。未实挂离离，瑛盘资荐庙。一

时偶僦人，游宴资饮饯。”从这首诗中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幅美丽的图景：淮安郡城东门之外，樱桃树苍翠茂盛；樱桃园北枕淮河大堤，河水汤汤东流入海……阳春三月，热气蒸腾，樱桃花开，犹如火烧，赤焰漫天；朱红色的果实，繁多茂密，或挂在枝头，或掩映于后，樱桃可用玉盘盛放，重重地摆放在几案之上，虔诚地祭奠神佛先祖。

樱桃园的名声大振，还与淮安历史上发生的两场战争有关。一场战争发生在宋建炎年间。据正德《淮安府志》卷之十一“祠祀志·祠庙”关于楚元王庙中记载：“宋建炎间，贼李成遣其将马进数万众来攻城，立望楼十余丈窥城东门。是夜，州人缚于神，潜自东门出，设伏樱桃园，迟明，贼众方攻城，伏兵突出，掩击望楼，楼上人不及下，尽杀之。时盛夏极暑，雷雨大作，贼乃奔溃。”楚元王庙原在运河西，淮安人感念楚元王在这场战争中的功德，把楚元王庙移到郡城中祀之。因此，崇祯庚午举人、淮安人张奕颖（字谷孙，号九霞）《樱桃园》诗云：“樱桃犹发昔年红，春色芳芬古郡东。花里藏兵能退贼，至今人说楚王功。”另一场战争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，（嘉靖）三十八年初夏，盘踞在庙湾的倭寇又聚众数千入西犯淮安城，巡抚李遂率官兵及民练（主要是沈坤的状元兵）在姚家荡一带大败倭寇，部分官兵们在樱桃园中设伏，与倭寇发生激战，大败倭寇，淮安倭患自此基本平息。这场战争的情况在杨其禄的《访樱桃

园故址》诗中后半部得到体现。“更闻御海神，寇散原无虞。即今风雨晨，鸟飞犹飘摇。乃知灵杰区，非仅供瞻眺。太平过百年，往事资凭吊。南时歌舞台，桑麻短。武备寄专阃，含情一长啸。”

从明朝开始，淮安人认为樱桃园在唐代即为淮安春日宴赏胜地，《天启府志》“艺文志”中载有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七言绝句《樱桃园》即为证明，诗云：“佳人芳树杂春溪，花外烟濛月渐低。几度艳歌清欲转，流莺惊起不成栖。”天启《淮安府志》卷之二十二“艺文志”中记载了天启《淮安府志》的编纂者方尚祖（福建莆田人，举人，天启二年任东河船政同知，崇祯元年，升应天府治中）的一首排律《淮郡志古》，诗人计用一百三十八韵，对淮安地理位置、历史沿革、乡才俊彦、农业名胜等进行详细描述，在序中他赞道“淮安，南国之名区，中原之都会也”，现在用诗句“诂标江左之风流，漫志楚东之胜概”。古代淮安的楚元王庙、公冶长墓、柘塘城、娑罗树碑、刘伶台、丽泽亭等名胜古迹几乎全部囊括其中，他用“樱桃园灼灼，枸杞井清渭。隐豹琳琅叶，宴花霓羽筵。清霄崖可访，紫极画应穿。望海来蜃市，藏春赋杜鹃”等诗句，把樱桃园列为淮安的古迹名胜。

现在，农业开发大潮风起云涌，有着刘伶台、杜康桥、樱桃园等宝贵资源的淮安区域东乡刘伶村，也可凭借着历史上这些大红大紫的古迹资源，发展集种植、养殖、加工、酿造、旅游于一体的特色农业，走观光农业之路。

HUAI AN QU BAO

2016年11月30日 星期三 责编:赵日起

段朝端邱锡彤《树菴馆诗草序》云：“邱氏多居城内，惟孝廉住河下。”此孝廉指邱广业、邱广德兄弟，此二人一为举人，一为拔贡。他们为什么要迁到河下呢？这里有个缘故。前面已经说过，邱氏籍隶淮安卫，负责运送漕粮到京城。邱广业继承了这一行当，结果运了两趟，不知出了什么问题，所运漕粮损失不少，把家产房屋都赔了个罄尽。邱广业母亲程氏死得早，父亲邱永庆无法，只好以诸生代替儿子运粮，结果死于通州。这时邱广业才十七岁，困窘已极。到通州处理一切事务以后回淮，与弟弟广德一起搬到河下，依附舅舅程氏居住，发愤读书，恢复家业。

当年淮安河下是淮北盐商聚居地。盐商都是外地迁人的，有西北山西陕西来的，更多的是从安徽新安来的。他们有程、吴、汪、金、曹等姓，以程氏的人最多，生意做得也最大。程氏来自歙县岑山渡，大致有三支，来的时间前后不一。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个叫程必忠的，到涟水经营商业，入籍安东。他的次子朝宣开始经营盐业，并迁居淮安河下。必忠生长子朝聘，朝聘生次子程增，程增生程鉴，程鉴生国梁，国梁有女嫁邱永庆，即为邱广业之母，邱心如之祖母。

程氏出了不少能人、名人。朝聘长子程增，字维高，号蝶庄。能诗工书，有干济才，做过淮南北盐商商总，为当道所重。康熙中，曾任浚河之役，工既成，玺书褒美，朝野诧为异数。康熙南巡过淮，他曾用他家的小戏子为皇帝表演娱乐。程鉴长子程奎，字坡士，年十三补弟子员。以军功除工部虞衡司主事，历浙江粮储道、金严衢道参议。好学工诗，兼善画梅，时与吕犹龙、高其佩画称三绝。三子程崑字夔州，南陂，号二峰，康熙五十二年进士，充武英殿纂修官，改兵部职方司主事，升武选司员外郎、会考府郎中。朝聘第三子程均，字又庠，以孝谨闻。博览群书，尤嗜左氏《春秋》，著《辨义》4卷。后贡入太学，任黟县训导，整历士子，文风焕然。

朝聘三弟朝微，字叔献，工书善饮，所交游皆淮安奇人高士，如刘雪舫、张虞山、胡天放之伦，朝夕过从，绝口不问家人生计，放怀纵酒以终。他有五个儿子，长子程坤，字根舆，号退翁，曾在淮安城东石塘之中桥黄河故道垦荒，买废田万亩，掘渠四千余丈，灌溉其中，遂成沃壤。植牡丹、芍药，以环其居，取王维《蜀川诗》“来者复为谁，空悲昔人有”意，名之曰“谁庄”，流连觞咏以终。三子程竣，字眷谷，号大川，是曲江楼第三代主人。住竹巷街，即寓园。其孙程易，字圣则，号吾庐，是淮北盐商之领袖。四子埏，字爽林，工诗文，善草隶。康熙四十四年举人，候补内阁中书。五子程城，后改名嗣立，字风衣，号水南、篁村，工行草书，善画。诗文苍深疏厚，气味醇古。乾隆中举鸿博。为时所推，名重海内。爽林、风衣弟兄主持曲江楼风雅，与吾淮周白民、刘万资、万吹、王家贵、邱谨、重慕、吴宁谧、达寿民、戴大纯等称“曲江十子”。河下又当南北之冲，坛坫之英，风雅之彦，道出清淮，鲜不至程氏园者。此外，还有知名翰林程晋芳，生于淮而长于淮，住河下乾鱼巷口，曾参与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，才名远扬四海，是袁枚的好朋友。

如果单从程鉴这一支来讲，也是可观的。他有五个儿子：梁（又名国梁，字北溟）、廷赓、源、沆、洵。最有名的是程沆和程洵：程沆（1716—1787），字濯豪，号晴岚、寿补，工文章，由举人官内阁中书，军机处行走，方略馆纂修。登乾隆二十八年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程洵（1717—1793），字通亭，号少泉，拔贡生，工诗。乾隆三十四年召试二等。程梁的女儿嫁邱永庆，是邱心如的祖母，所以他们都是邱心如的外叔曾祖。程梁长子世椿，字庄树，号春塘，岁贡生，官国子监典簿。原住湖塘，新居在竹巷街状元楼西。他就是邱心如的舅祖。世椿长子程元吉字文中，号蕲人，嘉庆十年进士，历官内阁中书、翰林院编修。性至孝，以父病弃官归，及门而父已歿，自恨未得亲视含殓，便终身不仕。他就是邱心如的嫡亲表叔。还有一表叔号剑溪名宏起，心如弟邱奕有诗《哭程宏起表兄》云：

五年聚首亦匆匆，笑语分明境转空。
溯到霍家亲更切，相逢何处哭秋风。
两世重泉感倍深，更嗟年少失知音。
清才埋没天何妒，说到成亏痛此心。

“感倍深”下自注：“剑溪表叔四月去世。”这位表叔是“清才”，肯定是一位读书人，只是被“天”埋没了。“霍家亲”则是袭用了唐代司空曙《喜外弟卢纶见宿》典故，西汉霍去病是卫青姐姐的儿子，卫家和霍家是表亲。强调他们的表亲的关系。

简言之，邱心如的祖母是程鉴的孙女，翰林庶吉士程沆的侄女，封翰林院编修程世椿的妹妹，翰林院编修程元吉的姑母，是富商兼达官的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。

潘德舆《邱君家传》云，邱广业弟兄的河下房屋是其表兄所赠。后来他的“中表程颢业不支”，未等表兄说话，他便将自己的房子卖掉，得钱数百两帮助表兄度过难关。他后来住在杨天爵巷，其弟广德住在竹巷魁星楼东。

邱心如的外祖家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拥有雄资百万，文化积淀深厚的书香门第。

邱心如舅祖程氏家世

刘怀玉

『坝口』与坝王庙

陈凤飞

“坝口”是下关境内一个历史地名，今人尚有称道，在古淮河（“黄河引”）南岸边上的地方。“黄河引”即《宋史》上所称淮河山阳湾，淮河原由钵池山南折，经山阳县新城北门，过下关再北折，然后向东入海，呈一弓形，淮安三城即在弓背上。后草湾河决，古淮河遂由弓弦上直抵涟水。明万历四年（1576），漕督吴桂芳开草湾新河，将古淮河裁弯取直，直抵涟水，于是山阳湾遂废。后犹作运盐河，日渐干涸，至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依旧有遗迹存在，下关金小堆北侧，保存有一湾死水，地方人称之为“黄河引”（因黄河夺淮入海，故淮河又称黄河）。

“坝口”即如末口，是运河入山阳湾的通道。据《明史·河渠志》记载：“仁、义二坝在东门外东北，礼、智、信三坝在西门外西北，皆由城南引水抵坝口，其外即淮河。”《河渠志》还记载：“漕船由二坝，官民商船由三坝入淮，輓输甚劳苦。”清光绪《重修山阳县志》记载：“仁字坝、义字坝，以上二坝在新城东门外，自城南引湖水至坝口，外即淮河，遇清江口淤塞，运船经此盘坝入淮，坝东为牵路，西即城基。”其实，《重修山阳县志》此条并不完全准确，因为明初即有漕运，在清江浦未开凿以前，漕船即由仁、义坝，“悉从沿东车坝入淮”。故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即筑仁字坝，永乐二年（1404），又从仁坝分出一水，名义字坝。

当年，坝口一带热闹非凡，因为漕船车坝入淮或盘坝入淮，是一项艰苦的劳动，需要大量的人力。由于运河与淮河水位不是一样高，而且相差较大，船只无法由运河直接入淮，故需在坝上设绞关，船下装垫滚木，将船只从运河绞上淮河堤，再用同样方法放入淮河中。一说盘坝前需将船上漕粮清空，再将船只绞上淮河堤，然后放进淮河中，将粮食再装进船。明代仁、义坝究竟有多少漕丁、坝夫，我们已无从知晓，我们只从宋代北神堰一则记事中，约略知道一些信息，宋天圣四年（1026），楚州北神堰、真州江口堰修船闸，“以时启闭，及成，漕舟果便，岁省堰卒十余万。”宋代北神堰将漕舟盘坝改为用船闸调节水位高低，岁省堰卒至少六万人以上，那么明代仁、义二坝的漕丁、坝夫至少应有二万人。这二万人的食宿消费，肯定对坝口地区的繁华，带来重大的影响。不难想象，当时的坝口客栈酒楼、店铺茶馆、书场戏院，一定是鳞次栉比，车马喧阗。明宣德五年（1430），陈瑄上言：“淮安府满浦五坝，坝废已久，其官吏坝夫，现无差役，乞令守视西湖堤岸，遇有损坏，就令修治。”（引民国《江苏省通志稿·大事志》）朝廷采纳了陈瑄的意见，这对五坝的繁荣是个不小的打击。然其后仍留部分人进行日常管理，以防止清江浦淤塞，漕船及官民商船仍需从五坝入淮，坝口尚存一线生机。

坝口附近又有坝王庙。这是漕丁、坝夫为保证漕船顺利过坝而祭祀上苍的所在，大约建于明初。笔者青少年时期曾见过遗址，只剩下一座影壁，上覆茅檐，前檐突出约一尺，后檐稍短。影壁上有三个方形实洞，一大两小，中间挂有坝王的图像，供人烧香有。

由于仁、义坝特别是义坝在下关存在的时间很短，且又呈大起大落的状况，故直到民国未年时，下关老妇有时骂不求上进、不好好事的未成年孩子，还用上“你这个小没寿的”“你这个小义坝子，短寿的”等词语。这又从风俗民情中，反映出仁、义坝确实在下关存在的证据。